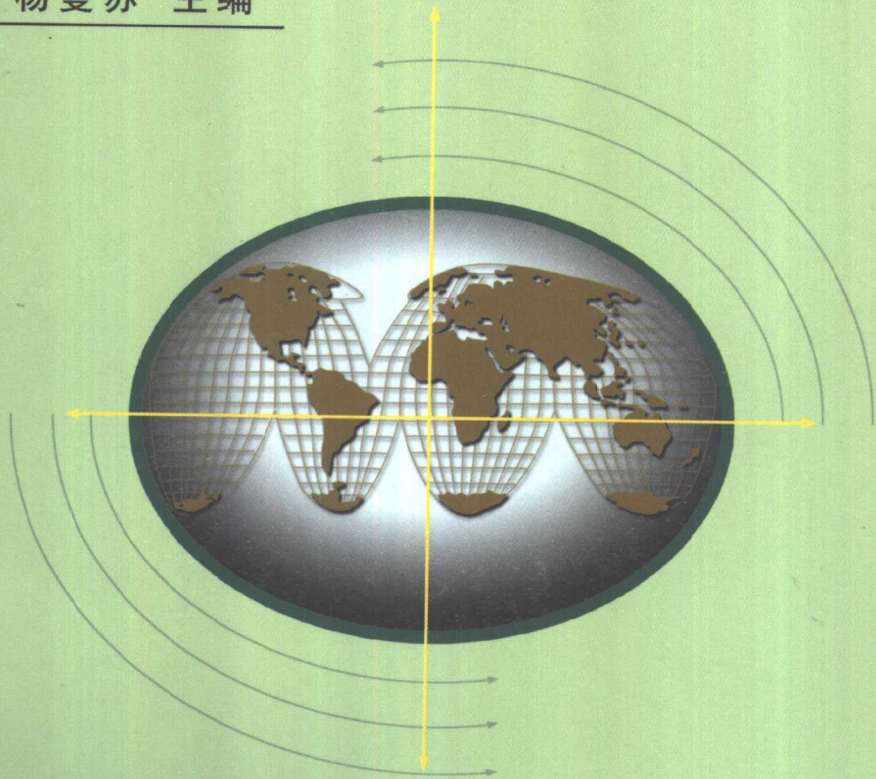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

热点问题

杨曼苏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 热点问题

杨曼苏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宇君

责任出版:夏凤仙

封面设计:郭宝珍

责任校对:张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杨曼苏主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4

ISBN 7-5012-1708-4

I. 当… II. 杨…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152 号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编:100010)

网址:<http://www.wapbook.com>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11½ 字数:260千字

2002年3月第一版 2002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2-1708-4/D·329 定价:21.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出版受到云南省省院、省校合作国际关系重点学科建设基金的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本书撰稿者：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人权	杨丹志
第二章	当前民族分离主义	张家栋
第三章	论恐怖主义的由来	张金平
第四章	外贸中的绿色壁垒	李程
第五章	冷战后的难民问题	李华
第六章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肖继江
第七章	世界上的非法移民	黎志军
第八章	全球毒品问题透视	杨晓辉

杨曼苏对上文做了修改和统稿，并写了前言，张金平也参加了统稿工作。

前 言

我们常在考虑，怎样才能加深对深奥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所遇到的国际关系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鼓足勇气去翻阅那些令人费解的理论书，找出一两个富有“哲理”的句子，以便说服自己和别人。好在我们都不大看重自己的“面子”，会对刚听到或看到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这种争辩往往会变成面红耳赤的争吵，末了自然是一笑了之。在这种争论中，在不经意之间，我们逐步习惯于用书本上的语言说明或回答问题，这可能对我们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本书也打算进行这种尝试，把一些对世界热点问题的研究心得写出来请教诸位读者、同行和专家，

想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批评指正，这对我们提高理论水平是大有好处的。

在本书中，学者杨丹志首先谈的是人权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议论很多，一些西方国家常指责我们违反“人权”，好像我们真做错了什么似的。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它们没弄清人权还有特殊性的缘故。我们对人权的普遍意义是赞同的，美国的《独立宣言》说得好：“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对这句话评价很高，称它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这说明我们并不反对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在于它还具有特殊性，这是西方国家容易忽视的。由于各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得不平衡，人们对人权问题关注的角度和内容不一。比如，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里，人们对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很注意，因为这跟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他们知道不把国家搞富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公民权和政治权问题——他们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由于人们对于解决人权问题的孰先孰后的顺序看法不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是难免的。《红楼梦》说焦大跟林妹妹想的不是同一回事，因为他们的身份和想法不同，看来是有道理的。

他还认为，人权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它既有保护某个人、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的积极作用，也有弱化它们地位的消极作用。这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吉普赛人。他们在二战中遭受纳粹的迫害最多，被杀戮的人占该民族人口的比例最大，但人们的同情心全集中到了犹太人身上，而蒙受了更深重苦难的吉普赛人却被人“遗忘”了。更消极的后果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常借“人权”为名大搞侵略之实，这种事例在历

史上俯拾即是，数不胜数。比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火烧圆明园之举，据说是对义和团反洋教之举和死了几个教士的“反应”。其实，欧美列强并不关心中国的人权，也不是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而来的，它们是为了改善本国在华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出兵的，八国联军用刺刀打开了中国市场并划分了势力范围。

作者很反感把人权问题政治化的做法，他认为有分歧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要互相理解和尊重。西方国家动辄要“控诉”哪个国家和指责谁，这于事无补，只会适得其反。现在许多西方国家大搞“人权外交”，以为只要打起“人权”旗号，就握有让对方哑口无言的“王牌”，即使对那些不合口味的国家动武也不要紧。实际上，这些国家往往只看到别国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殊不知自己也有人权问题，只不过它们没注意或装作没看见而已。而且，它们还把人权问题说成是超意识形态的，是超政治的纯人道主义问题，这是可笑的。实际上，“人权外交”从一开始意识形态色彩就很浓，在冷战时期它直接服务于东西方的对抗，在后冷战时期它致力于颠覆剩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

国际关系中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民族分离主义，这两年它闹得风风雨雨的。学者张家栋指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掀起过四次民族主义浪潮，第四次浪潮的特点是大搞分离主义。原因不外乎：冷战结束后的刺激、种族或宗教因素的推动、对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应、西方国家的恶意煽动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民族分离主义这两年来可谓“战果辉煌”。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几乎在一夜间瓦解了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一下子制造出了约20个国家，在其他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里也战绩不凡。当前，全世界要从其母国中分离出去或有分离愿望的民族就有 2000 多个，几乎涉及国际社会所有成员。1994 年的 23 场战争中有 18 场是因民族分离主义引起的，2000 年的 51 场战争中有近 20 场是由于分离要求所致，在全世界的难民中有 2700 万人是由于民族（或种族）冲突产生的。仅从这点来看，民族分离主义是国际形势动荡的主要根源是无疑的，是世界上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热点问题。

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如果把占总人口 90% 以上的民族称为“主体民族”的话，那么在全世界近 200 个国家中只有 20 个国家属于这种类型，而剩下的国家都有可能发生分裂。只要想一想这种兵荒马乱、烽火四起的景象，就足以使人不寒而栗了。所以，从民族自决权绝不能自然地得出每个民族都要独立的结论。一个民族是否应该“独立”，不但要看它的历史，还要看它当前的状况。

张家栋提醒大家，民族分离主义看来气势汹汹，似乎势不可挡，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关键要看它是否有掀风作浪的基础。实际上，每次民族主义的浪潮都不长，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与环境的产物，并且它也阻挡不了民族融合的趋势。他还提醒人们，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主权在某种程度上会出现弱化的迹象，这是每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都会遇到的情况。正像房门被打开一样，新鲜空气飘了进来，苍蝇和蚊子也跟着飞了进来，这是难免的现象。对此我们不必惊慌，也没有理由惊慌，只要牢牢地掌握着大局，国家的基本主权是有保障的。

“9·11 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问题引起了各国的重视。大家都知道，现在恐怖主义已超过了一国界限走向世界，被称

为“国际恐怖主义”。学者张金平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他认为，人们对恐怖主义问题并不陌生，从古到今这种活动就没中断过，只不过它攻击的对象、手法和目的有所不同而已。有几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那就是什么叫做恐怖主义，现在的恐怖主义分为哪几类，它们都有些什么特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如何，等等。我们在这里谈的是政治恐怖主义，那种绑架之类的纯经济恐怖主义不在讨论之列。

可能，人们能接受的定义是：政治上的恐怖主义，是为了改变某一政治进程或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对一些人或一个集团采取的暴力行动。它有三个特征：1. 极端的意识形态；2. 残酷的暴力手段；3. 特定的政治目的。它又可以细分为四种：（1）国家恐怖主义——由国家出面进行的恐怖主义，如伊拉克侵略和灭亡科威特之举；（2）极端派党派的恐怖主义——由于政见不同进行的恐怖主义，如缅甸开国元勋昂山被杀事件；（3）与民族分离主义相连的恐怖主义——如斯里兰卡猛虎游击队的自杀性袭击；（4）宗教推动的恐怖主义——如以色列极右分子戈尔茨坦枪杀希布伦清真寺里的穆斯林。

恐怖主义名声变臭是近年来的事，现在已变得臭不可闻了，给人一种破坏安定局面和极不负责任的印象。它跟人们选择的道路、世界的潮流和民心的向背完全唱反调，它每次行动给人们留下一个冷酷无情的、血肉模糊的、毫无理性的印象。当恐怖主义最终把矛头对准平民百姓之际，它表现了自己反人类的本性，成为国际社会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暴露出其色厉内荏的本质。

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在公众中制造恐慌情绪，达到使人们慑于淫威言听计从的效果，从而取得比依靠本身实力进行较量而

更显著的效果。它的奇特效果是从心理上得来的，惯用的手法是搞突袭，让人来不及反应，防备能力大打折扣。而且，它在第一次袭击后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要进行第二次袭击，使人处于防不胜防、提心吊胆的状态。为求得安宁和家人安全，受害者往往违心地接受恐怖分子的条件，恐怖分子因而在这种不对称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搞恐怖主义只能表明其策划者的怯懦和空虚，承认自己在正面较量中难以取胜，其疯狂行为是得不到世人同情的，这是恐怖分子只会落得悲惨结局的原因。我们多次明确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任何组织在任何情况下对无辜百姓的杀戮，不管这些组织有多么“正当”的理由。现在，国际社会对什么叫恐怖主义的看法正趋向一致，即看这些亡命徒行动的对象是谁，是根据其手段而不是其目的来进行判断的。这个标准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对暴力行为做一番粗浅的判断还是可以的。

恐怖主义的产生是有原因的，作者总结出好几方面的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刺激，它使那些赤贫者感到沮丧，继而绝望地铤而走险，许多人认为这是滋生恐怖主义的一个来源。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社会中存在着贫富差距，它是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客观现象，并且它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关键是要减少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执法不严的现象；二是人们对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蛮横作风和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非常反感，一些反美恐怖事件恐怕与此有关。当然，在每次遭到袭击后美国警方总是加强防范措施，但我认为，恐怕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要采取平和态度和一视同仁的做法。这样，才能

表现出美国并不偏袒哪一方，使恐怖分子连借口都找不到。

正当我们为增强国力而全力拼搏之际，外贸领域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即“绿色壁垒”问题。所谓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以保护生态和环保为由，要求出口产品从研发到运输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否则就限制或禁止这种产品的进口。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李程告诉我们，这个问题以前虽然很少有人听说过，甚至有的人还不知道有这回事，但它在我国入世（WTO）后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是外贸出口大国，而且在想方设法地扩大出口，而对方再用关税壁垒或进口限额卡我们显得过时了，于是它们便使用似乎理由“正当”的绿色壁垒，在我国入世后使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多。

绿色壁垒的建立有其政治、经济和环保意识上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在经济方面，这两年许多国家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它们的发展无不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它们的财富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掠夺积累起来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致使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急剧变坏：气候变暖、臭氧层减少、酸雨、干旱和土壤沙化等，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人类本身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发达国家的民众对绿色产品的偏好，促使他们在外贸中对环保产品的偏好，也使某些国家借环保为名在外贸中对我国设置障碍。

绿色壁垒对我国的出口很有影响，作者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1978—1996年我国出口的增长速度是每年15%以上，但到1997—1999年期间我国的出口变得停滞不前了，除了全球经济不景气外主要原因是绿色壁垒作梗。1995年，美国宣

布对中国虾类制品“自动扣留”，原因是中国的渔船上没有装备海龟逃生装置，危害了海龟的生存。使我国出口美国冻龙虾由1995年的1203.9万美元减少到1997年56.7万美元，冻螯虾由23.8万美元减少到2.4万美元。机电是我国外贸出口的大头，也是方兴未艾的产业，1995年的出口额为438.6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25倍。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以严格的环保标准卡我国，用污染、噪声、电磁辐射标准等理由卡我们，致使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很难扩大。

作者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跟外贸中的反倾销税一样对我国外贸同样有害，而且是担心我国产品竞争力的国家越来越习惯采用的措施，在涉及到经贸时有的国家也不那么讲理。我们现在就要重视和改进这个问题，不仅可以打破它们新的外贸壁垒，有利于我国扩大外贸出口，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我们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意识。

李华在他的世界难民问题研究中，给我们勾勒出一幅世界难民的悲惨画面。1951年，联合国给难民下了个有争议的定义。它认为，难民是指那些由于种族、宗教、民族和政见等原因，得不到本国保护或现居于国外不能或不愿回国者。据联合国统计，1960年全世界有140万难民，1976年达到了280万人，1980年跃升为820万人，1992年达到1820万人，1997年达到创记录的2300万人。这里所说的难民，只是符合联合国标准的难民，还不包括那些为逃避战乱或自然灾害的人，因此世界难民的 actual 人数远远超过这个统计数字。据估计，2001年全球有5000万无家可归者，在今后十年中全球无家可归者可能达到9000万人。

作者归纳了难民形成的原因：其中，比例最大的还是战乱

造成的难民，俗称“战争难民”，当前全世界有 2000 多万正式难民，基本上都是世界热点地区附近的居民。其次是民族与宗教冲突产生的难民，这也可以被包括在战争难民之中。有人估计，目前在全世界有 2700 万正式难民，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由于民族（种族）冲突造成的。第三部分是环境恶化造成的难民，俗称“逃荒者”。他们还不算正式的“难民”，因为他们不符合联合国给难民下的定义，但享受难民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世界上这类难民多了起来，因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在严重恶化中。

难民问题对国际关系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第一，他们容易对收容国的主权造成威胁，在中东的贝鲁特和约旦王国都发生过这种问题，闹得收容国政府差点垮了台；第二，难民潮往往也对国际安全有消极影响。难民往往有不安分的骚动情绪，当这种情绪与其他因素汇合时，往往会爆发出使收容国瞠目结舌的暴力行动，我们在香港难民营就看见过这种现象；第三，众多的难民突然涌来会对收容国造成巨大压力，而最初收容他们的几乎全为贫穷国家，这往往也会造成一些地区不安宁的国际问题。

全球化和一体化给人们带来了财富和方便，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首要的就是对国家主权的冲击，肖继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冲击是必然的，因为全球化进程导致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加强，必然导致对主权国家有形或无形的边界的突破，在此情况下固守本国疆界的做法已经变得不现实了。同时他认为，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已不可能完全依靠本国力量进行发展，它已同世界经济程度不同地连为一体，其他国家的经济运作很容易被看成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当

前，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的减弱已是不争的事实，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各国政府多处于瘫痪状态已说明了这点。

国际组织的某些做法也会损害国家主权。一些有权势的国际组织享有采取自认为必要行动的权利，并要求那些求助国家按它们旨意办事，从而对其他国家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利形成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善后处理过程就表明这点。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前来挽救东南亚经济，该地区各国只有按它旨意办事才能获得贷款，否则就无法摆脱这场危机。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与销售早已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廉价的原料与劳力供应地、最佳生产场所以及利润最丰厚的市场。它们所在国的政府，出于种种考虑给予这些跨国公司许多优惠，甚至不惜牺牲某些主权来满足它们的要求，这对国家主权造成一定的冲击。另外，科技和信息的全球化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捷，但它们的弱点是容易扩散和泄密，直接关系到当事国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对该国的国家主权也造成了不小的威胁。总之，在大经济大发展的时刻，想保全国家的主权并不是件容易事。

作者认为，对国家主权的完整必须以辩证目光来看，国家主权应该是一个变与不变的有机体。国家主权的演变和弱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看其核心内容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要避免发生这种变化。只有理解了国家主权有这种特点，才能理解我们积极参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初衷。

黎志军研究的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了当前重要的国际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副秘书长道格拉斯·斯塔福前几年曾预言：“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将是今后 10 年内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要区分非法移民与难民并不困难。非法移民是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收入为目的，采取非法手段向目标国移居，其中多数人被称为“经济移民”。非法移民的另一种形式是非法滞留，是指外国人依据某种合法身份（如留学、探亲、旅游、开会等）进入一个国家，但因种种原因停留的期限超过了所在国政府的允许；而难民则是由于战乱、种族迫害或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出于生存需要到其他国家避难者。两者最主要的区别表现在行为者的主客观上：非法移民是主动到目标国移居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谋求良好的工作条件；而难民则往往是被动地离乡背井的，是外力和环境压迫所致。国际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也不大相同：他们不大同情那些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找不到说得过去的理由是不容易得到合法身份的；而世人对难民状况比较同情，他们能得到国际组织的援助，一有可能便可取得合法地位。

非法移民在目标国里的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那些一无所长又不能吃苦的人，跟原来的想法有一定差距，许多人因而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少数人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他们主要参加的犯罪活动有：国际恐怖活动、绑架勒索、制毒贩毒以及贩卖人口等。非法移民有时也会影响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甚至引发国际政治危机。非法移民问题有时还会影响多边国际关系。2001年8月，一艘挪威货轮满载着在太平洋上救起的430名非法移民驶向澳大利亚，但澳大利亚不准这艘船靠岸。最后此事虽获得“解决”，但澳大利亚、挪威、新西兰和瑙鲁等国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

它还影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些发达国家出于利己考虑对非法移民的变相纵容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

主要原因。实际上，发达国家欢迎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移民前来，即使他是个非法移民也不要紧，发展中国家气愤地称之为“脑力剥削”，说他们花了很多金钱和时间培养出的人才，让发达国家一分钱不花地“拿”去用了，他们好不容易培养出的人才就这样去为发达国家服务去了，怪不得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发达国家不反对外国人来干最粗笨的脏活。而发达国家则反唇相讥地说，这些有本事的人是自愿要来的，谁也没有强迫他们来。而且，它们指责发展中国家不爱护本国的人才，压制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能，甚至唆使他们向发达国家移民或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影响是复杂的。对于非法移民比较集中的沿海地区来说，大批轻壮年劳动力弃农而走，意味着那里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人口及就业压力的减小，好像是件好事。消极后果之一，是当地的农业产量急剧减少，乡镇企业生产呈萎缩状态。此外，非法移民要向组织者（中国人称之为“蛇头”）缴纳数万美元的偷渡费，这是使该国外汇流失的一条渠道，而组织者（蛇头）一般都把这种钱用于各种奢侈性消费，很少流入生产领域，因此又在一定程度上“挪用”了资金而影响再生产。

非法移民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消极影响还在政治方面，这又与人权问题挂起钩来。非法移民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早日还债，急于获得可公开打工的难民身份，往往依靠反华势力的帮助申请“政治避难”。文化素质低的非法移民并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加上西方一些媒体的极力渲染，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好在西方国家现在打住“政治避难”的势头，因为它们早就知道这批人是“经济移

民”，其目的是到它们国家来打工赚钱，那些编得催人泪下的故事全是假的。

杨晓辉的世界毒品研究，揭示了国际反毒斗争形势的严峻。目前全世界吸毒者有 1.8 亿人。其中，有 1.4 亿人吸食大麻，有 1300 万人吸食可卡因，有 860 万人吸食海洛因，有 3000 万人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全球每年有 10 万人因吸毒而死亡，有 1000 万人丧失劳动能力。毒品年交易额每年在 5000 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 8%。这些数字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没想到问题竟会如此严重。

他的研究还告诉我们，位于东南亚地区缅老泰边界的“金三角”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它的老大位置由后来居上的“金新月”所代替。“金新月”位于南亚地区，由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边界地带构成，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供应基地。其中，阿富汗的鸦片产量已由 1989 年的约 1200 吨猛增到 1999 年的 4600 吨，远远超过了当年“金三角”地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缅甸，1999 年阿富汗生产的鸦片占全世界鸦片产量的四分之三；我们也不能忽视中亚地区对毒品泛滥的“贡献”，在 1989 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中亚逐步变成全球毒品贩运的主要通道之一。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中亚毒品流量增长了数十倍，仅吉尔吉斯斯坦一国，1996 年被截获的毒品达 2.189 吨，而这个数字与真正出入该地区的毒品相比只是冰山的一角；当然人们很关心金三角的状况。金三角现在有了新的发展方向，集中精力生产易制化学合成毒品，并大有取代鸦片和海洛因生产之势。南美洲为全球可卡因和大麻的主要产地，人称“银三角”。13 年前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仅为 2 万公顷，到 2001 年上升到了 16 万公顷。2000 年，有 650 多吨可卡